

早期澳門的教會教育

顏廣文* 張海珊**

近代來華傳教士的教育活動與中國從傳統走向封建的教育、近代教育體制的轉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這樣說，教會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變革的溫床。不過早期傳教士辦的教會學校，其志不在教育人材以促進教育之進步，而是希望以學校為輔助之物，助其宣傳福音之業，辦學實為一種傳教手段。儘管如此，教會教育對澳門華人教育的貢獻以及具有正面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探討明清時期澳門教會教育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演進。

明清澳門教會教育興辦的的由來

中國傳統學校教育側重“義理、詞章、考據”，和社會生活脫離。以清朝教育制度為例，基本上因襲明朝，但偏重科舉，官辦學校實則為科舉服務，各地所立私塾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補充場所，學生所學不外是《三字經》、《千字文》和《四書》等課程，教法祇有課讀與背誦兩種，很少有講解，其主要目的是為應付鄉試，祇要求學生懂八股文，因此根本學不到科學知識，而能擠入統治集團當官的也祇是極少數，庶民子弟入私塾的機會很少，大部分是文盲。清朝統治者在鴉片戰爭失敗後對此現象仍無動於衷，雖有少數開明者曾經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但是一直延至19世紀60年代，才有一些改革。⁽¹⁾

自從明朝中葉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商人紛紛來澳門貿易，從中贏利；耶穌會的大批傳教士也同時隨商船來澳門進行傳教活動。⁽²⁾澳門在明清中西關係史上一直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自16

世紀中葉開埠後，它不僅是基督宗教在遠東最早的傳教基地、輸送傳教士進中國內地的管道，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管道；又是中國對外開放和中西文化、經濟交流的前沿陣地。按世紀慣例，“基督教”為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統稱。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亦稱“公教”、“羅馬公教”、“舊教”）、東正教（亦稱“正教”）、新教（亦稱“耶穌教”、“更正教”）和其它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常以“基督教”一詞作為“新教”的專用名稱。

葡萄牙為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葡人租居澳門後，便積極辦教傳教，興辦教育事業。“宣揚耶穌基督的學說，實行基督的思想，亦是葡萄牙民族的一貫作風。”⁽³⁾天主教素有重視教育的悠久傳統，為佈道而興教，以興教促佈道。根據資料顯示，天主教在過去漫長的四個世紀中為澳門這座以天主聖名命名的城市興辦學校，培育青少年；眾所周知，約有一半的青少年在教會學校學習，其中一些學校隸屬於澳門教區，另外一些隸屬於宗教組織或隸屬其管理。⁽⁴⁾可見，天主教在澳門教育發展史上擔當了不可或缺的職責。

*顏廣文，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研究員，主要學術領域為明清史、廣東古代歷史地理，已出版著作《古代廣東史地考論》，《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合著）（1998年獲廣東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已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

**張海珊，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修明清史方向，任職澳門培正中學，已發表論文〈試論秦始皇〉、〈明朝守澳官的行政架構及其對後世之影響〉及〈晚清時期澳門博彩事業的興起及對本土文化的衝擊〉。

天主教在澳門的教育事業

澳門的教會教育歷史可追溯至開埠初期。自1553年以後，耶穌會士紛紛隨商船來澳傳播天主教，早於1572年即創辦了澳門聖保祿公學。此澳門初級學校創辦時首任校長為瓦斯（António Vaz），另有八名耶穌會神父輔佐，並以學校作為培養遠東天主教傳教士的基地。鑒於在1565年11月21日，向明朝守澳官提出要進入內地傳教的要求卻因傳教士不懂中國話而遭到拒絕的教訓，耶穌會規定：凡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一律要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在1579年已有一百五十個兒童來上

學，到1584年底增至二百人。⁽⁵⁾自從1572年耶穌會在澳門建立起該所傳教基地後，得到葡王舍巴施底奧（D. Sebastião）的贊許，並獲諭令，從麻六甲海關稅款中每年撥1000元充作該校的經費，到1579年紅衣主教殷基利（Cardeal D. Henrique）承襲王位後，經費增至每年2000元。⁽⁶⁾至1594年創辦中國最早的教會學校和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首任院長為孟三德神父。⁽⁷⁾

在聖保祿學院正式創辦前，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神父曾於1580年創辦過一所傳教實習所。它既是用作專門培養中國初修士的學校，同時又為來華的歐洲傳教士提供了一個學習漢語的場所。利瑪竇神父稱這所學校為“聖瑪爾定經言學校”。羅神父則曰：



1594年耶穌會學塾昇格為聖保祿學院，成為遠東最早的西式高等學府。
（圖片來源：http://static.flickr.com/106/293266364_824533c3b2.jpg (google)）

我稱這座房舍為“經言學校”，因為在這裡我們給中國人講道理和付洗。這座學校非常重要，外教人也都對它非常佩服。目前我正在這裡學習中國語文，這些教友無疑變成為最佳的翻譯，為傳教工作將有很大的德益。⁽⁸⁾

羅明堅、利瑪竇、孟三德等教士之漢語也是在此校學習的。

後來，遠東教區巡視員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於1592年在日本長崎召開了第一次遠東地區副主教會議。在會議上，他提到有必要為日本及日本以外的耶穌會士建立一所修院。澳門雖然地處遠東之中心，是一個頗理想的地方，不過因為當時主要著眼於培養日本傳教士，而不在中國，所以會有反對聲音。經過一番周折後，最終在得到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命令葡印總督及果阿副主教批准了范禮安在1594年11月所提出的那一份關於“在澳門建立一個像果阿聖保祿學院一樣的遠東傳教中心”的議案。耶穌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 de Quadros）委託貝勒茲、代宰拉和平托三人，將原來祇有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陞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即在澳門初級學校和聖瑪爾定經言學校合併的基礎上擴建為澳門聖保祿學院或稱澳門修道院。⁽⁹⁾它是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然而嚴格來說，澳門聖保祿學院並不是一所完全的基督教大學，因為在這所學校中的確不教授天主教法典，又沒有設立民法和醫學學科，規模也比擁有這類機構所有學科的非教會大學小很多，譬如科英布拉大學；但它向完成課程的學員授予學位，故毫無疑問仍是一所真正的高等學術中心。⁽¹⁰⁾聖保祿學院的學制分為兩部分，一是初修院（即預科教育），一是神學院（六年制），完成神學課程即可授博士學位。1594年12月1日正式開學時，該院已擁有四個班級：1）二百五十人的讀寫班；2）語法學班；3）人文學班；4）藝術課程班。⁽¹¹⁾招生對象大部分是歐洲的傳教士和一部分中國、日本的修士。塞梅多（Semedo）神父於1643年記載，當時祇有九十名葡



范禮安神父，1539年出生於那不勒斯王國阿布魯齊的基埃蒂，1606年1月20日在澳門死於尿毒症。（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一期頁41）

萄牙人和澳門土生的子女在該校低年級班級即初修院中就讀。⁽¹²⁾聖保祿學院屬下實際上就有兩所學校，一是專為澳門本地人及葡萄牙人子女（包括本地土生人）開辦的初修院，另一是專門為日本傳教士開辦的聖依納爵神學院，而培養中國傳教士祇是在初修院和神學院中兼而為之。⁽¹³⁾

自清朝康熙皇帝晚年開始，中國內地禁教的風氣愈演愈烈，入華之西方傳教士要在中國內地學習漢語的機會大幅減少。在1710年（清朝康熙四十九年），玄燁曾明確下令，命新來的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學習中文：

新來之人，若叫他們來，他們俱不會中國話，仍着爾等做通事，他們心裡不服，朕意且教他們在澳門學中國話語。⁽¹⁴⁾

又據康熙四十九年兩廣總督趙弘燦的奏摺稱：



曉明學校

(選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澳門百年特刊》
1903-2003，頁8，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聖羅撒英文中學

(選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澳門百年特刊》
1903-2003，頁19，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聖羅撒中文學校

(選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澳門百年特刊》
1903-2003，頁19，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傳聖旨。再，西洋新來之人，且留廣州學漢語，若不會漢話即到京裡，亦難用也。⁽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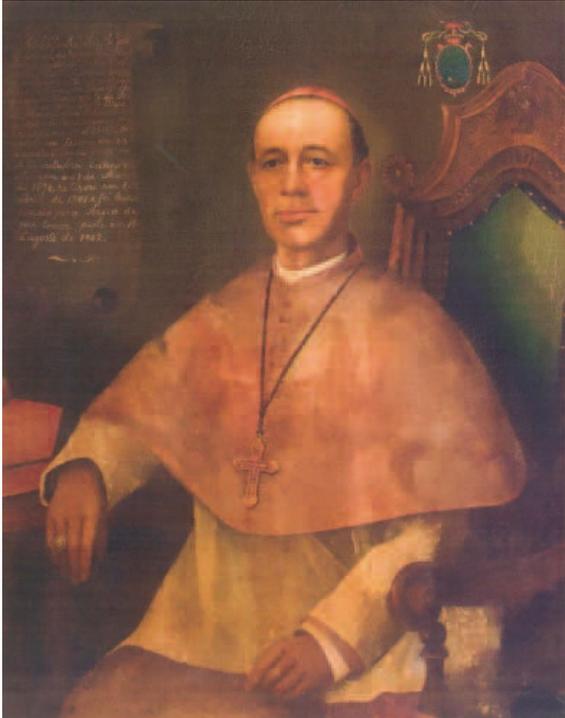
從上述資料得知，當時的西方傳教士應該多集中在澳門和另一個歐洲傳教士合法的居留地廣州學習漢語。

在澳門可以學習漢語的地方實則並非祇有聖保祿學院。因為從16世紀末開始，除耶穌會外，其它天主教修會亦開始在澳門設堂建院，如1579年首批方濟各會士六人到澳門建修院，名曰“聖方濟各修道院”，又名“天使聖母修道院”；在一段時間裡，那裡還曾設過一所神學院。1584年則有一名西班牙籍奧斯定會士在澳門建修院，1586年擴建，到1589年時，修院達三十六人之多，名“恩寵聖母修道院”，1589年由葡籍奧斯定會士接管。多明我會於1588年獲葡印總督批准，有十三名西班牙籍多明我會教士來澳門建修道院，後被葡萄牙籍多明我會接管，並建起了一所讀寫拉丁文的學校，學校還設立藝術課程。1633-1634年間方濟各會之嘉諾撒修女會來澳門建“嘉諾撒女修道院”。⁽¹⁶⁾ 1623年擔任澳門市政廳書記官的雷戈曾說：

本市有奧斯定派、多明我會和聖方濟各會，有很好的教堂和修道院，每座教堂和修道院一般居住着七八個教士。⁽¹⁷⁾

這些修道院規模雖然比不上聖保祿學院，但它們均有培養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的任務。如澳門聖多明我修道院(俗名板樟堂)則是“在福建(中國)、麻六甲和帝汶傳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道明會或稱多明我會成員的立足點和庇護所”。⁽¹⁸⁾

繼聖保祿學院之後，在澳門為中國培養輸送傳教人材的又一所知名的高等學府聖若瑟修院(St. Joseph College，亦可譯為“聖若瑟神學院”、“聖若瑟學院”。“聖約瑟學院”，俗稱“小三巴”)，於1728年由耶穌會創辦，是澳門歷史上最主要的教育中心之一。⁽¹⁹⁾ 因此文德泉神父稱：



嘉惠勞主教 (D. José Manuel de Carvalho)，1844 年出生，1897-1902 年任澳門教區主教。1898 年來澳，隨船帶來嘉諾撒修女七人、司鐸二人及修生十名。任內曾擴建白鴿巢育嬰培幼院。他在氹仔所開辦的學校及孤兒院交由嘉諾撒修女管理。(選自羅玉成神父主編：《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簡介 (1576-2006)》，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2006 年 6 月，頁 35，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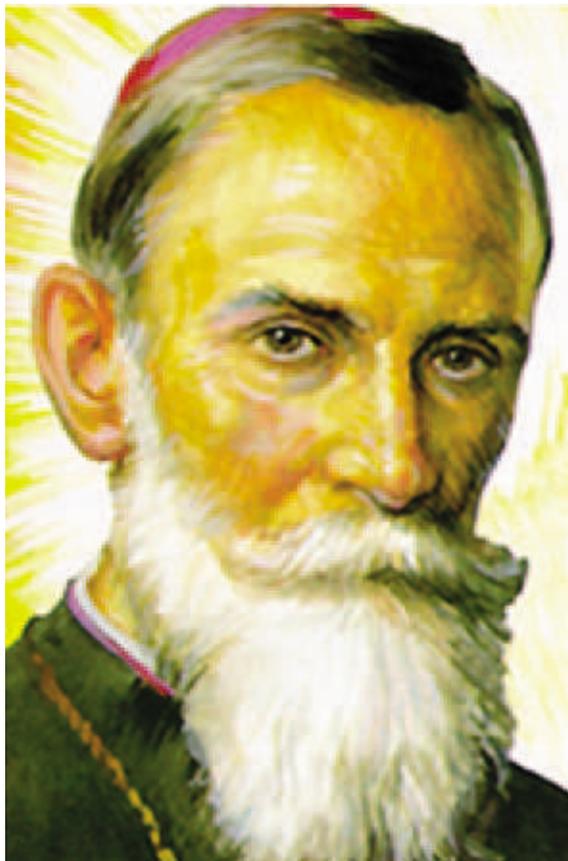
於是，就有了兩個神學院：聖保祿學院和聖約瑟修院。兩者皆為耶穌會建立的。前者屬於日本大教區，後者則屬於中國中教區。(20)

聖若瑟修院的創辦背景與聖保祿學院大致類同，主要是為栽培在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是澳門的第二所高等學府。林家駿主教也稱：“聖約瑟修院創辦之初，祇可以算是聖保祿書院的分院，專為培植中國傳教士之用，因此華人俗稱它為‘三巴仔’，而前者則稱之為‘大三巴’。”(21)由於耶穌會解散，1762 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同時關閉，直到 1784 年由北京教區主教湯士選 (D. Alexandre



鮑理諾主教 (D.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1852 在葡國亞速爾群島出生，1902-1918 年任澳門教區主教。1903 年來澳履新。神學生高若瑟隨行來澳，在聖若瑟修院繼續就讀。到任後，他聘請方濟各會修女來澳工作，又邀慈幼會士來澳開辦工藝學校。(選自羅玉成神父主編：《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簡介 (1576-2006)》，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2006 年 6 月，頁 37，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Gouveia) 復辦聖若瑟修道院，1784 年 10 月 1 日正式開學，首任院長為葡萄牙人瓦倫特 (Manuel Correia Valente)。(22) 修院重新開辦時，祇有八名學生。在 1812 年教難中，北京修道院被取締，遂於 1820 年將修道院遷移至澳門，所有遣使會士及修生也一併來澳。(23) 到了道光初年，該院共為遣使會培養了三十三名中國籍神父。(24) 1829 年，中國籍會士薛瑪寶 (Matthew Sue) 僅從內蒙西灣子一地就派了八名修生到澳門。(25) 可見經過一段艱苦的歲月後，修道院學生人數大幅增加，使澳門在培養中國教士事業方面獲得很大的發展，再次成為向中國教區輸送人材的重要基地。



聖類斯·雷鳴道 (St. Louis Versiglia, 1873-1930)。慈幼學校由雷鳴道神父創建，名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選自 <http://www.sdb.org.hk/cp/p04/p04.htm>)

此外，澳門教區也重視女子教育問題。在1792年由澳門教區主教施利華 (D. Marcelino José da Silva) 開辦的聖羅撒培幼院，是最早的西式女校，其招生對象為葡籍女童和華人女童。創校以來聖羅撒學校歷經變遷，1792-1911年間，聖羅撒學校曾分別由三個修女會主辦，開初屬於教育和慈善性事業，後來該校“從收容社會上被遺棄的孤女開始，到承擔政府委託辦葡女學校”，及至20世紀上半葉後，該校又“從葡文女子學校到中文、英文、葡文三部鼎立”⁽²⁶⁾。另有由嘉諾撒修女會在1873興辦大炮臺山麓要理識字班。1886嘉諾撒修女會仁愛書院在白鴿巢開辦葡文女校，該校在嘉惠勞主教 (D. José Manuel de Carvalho) 任內曾擴建校舍。其後嘉諾撒修女會於1895年在氹仔開辦要理識字班，教當

地村民子女識字；1901年接受政府津貼，開辦私塾；1903年於十六柱大屋創辦嘉諾撒恆毅書院，教授女生刺繡、縫紉等；同年在路環開辦女生私塾。1910年葡國革命，驅逐修女離澳，嘉諾撒恆毅書院遂停辦；路環女生私塾在1905年也因海盜橫行停辦。至1906年耶穌會高美士神父 (Pe. Adriano de Souza Gomes S. J.) 在望廈建救濟院——望廈聖方濟各學校，交由嘉諾撒修女接辦，內附女童學校。⁽²⁷⁾ 1911年鮑理諾主教 (D.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 遣嘉諾撒修女在氹仔開辦聖善學校，收女生六十人；在堂側設有男校，學生十人。這是天主教在澳門氹仔興辦華文義學之始。至1968年，葡人稱該校為鮑理諾主教紀念學校。

晚清時期澳門的教會教育從偏重宗教教育漸轉變為重視世俗教育、科技教育。如葡萄牙國王唐·卡洛斯 (D. Carlos) 在1893年7月27日頒佈命令：重新在澳門開辦中學教育，創辦了澳門利宵中學，培訓天主教神職人員。到1894年4月將經翻新的聖奧斯定修道院院址移交給校長作為校舍使用，同時任命了教師團，1909-1910年有十八名學生就讀普通中學課程，十九名就讀商科。1906年由天主教慈幼會雷鳴道神父 (Fr. Louis Versiglia) 於風順堂街創辦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前身是收容男孤兒的“無原罪孤兒院”，至1937年正式獲澳門教育廳批准立案，易名為“鮑思高紀念中學”，1952年因與“葡光學校”之葡文校名相同再易名為“慈幼學校”。），開校時有走讀生三十五人，寄宿生五十人；1910年開始成立木工、縫紉、革履、排版、印刷、釘裝等六項工藝課程，成為一所職業學校，另依照各生程度，授以普通學科，另設銅樂隊及體育班，以培植專門人材。⁽²⁸⁾ 它的辦學宗旨是：“教之以學藝，導之以修德，使諸生能養成工業之技能、處世之知識、優美之人格。”

此外，屬方濟各女修會的黑巾姑娘 (Irmãs Canossianas) 在澳門辦有天主教學校數所，計有瘋人廟側之學堂、氹仔之學堂、望廈方濟各·沙威學堂、過路灣學堂，以及三巴門善堂所屬的義學兩間，其一是進教會者不在堂住宿的學童，有一百一十八名；氹仔亦有一間，有五十名學童。今澳女學



聖善學校（選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澳門百年特刊》，1903-2003，頁13，原書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塾甚多，所以該堂之學生分散別學，自無妨礙。至於其它教會學校學生人數，“花王廟之義學、望廈之義學，所有學生凡住堂的早已搬出，內有十八名不是華人。而三巴門善堂華學生三十人，方濟各·沙威學堂學生二十七人，均搬出澳外。另望廈義學有華學生三人，花王廟義學華學生二十一人遷往育嬰堂。（……）至於住宿善堂內之學生，查明有五十八名，不是華人，已回住家。另三巴門住堂之華學生三十三名及望廈住堂（華）學生三人，亦均回家。”以上史料表明，這幾所天主教教會學校在生源上是中西兼收的，“華人學生可以往就華人義學，其非華人，亦可往就公局所立之義學”⁽²⁹⁾。

從上述內容可知，明清時期在澳門辦學的天主教會如耶穌會、仁愛會、方濟各會、嘉諾撒會和慈幼會等，長時期承擔了澳門教育的主要職責。進入清末，澳門教會教育得到持續發展。但因為1834年、1857-1887年和葡萄牙下令解散澳門天主教會，沒收教產，放逐教士，或阻撓羅馬教廷委派澳

門主教，從而嚴重限制了澳門天主教教育的發展。此外，在中國封建社會，女性長期受歧視，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然而女子教會教育卻是整個教會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興辦女子教會教育的天主教修會主要有嘉諾撒會、仁愛會、慈幼會等。澳門女性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是以教會女校為發端的，如天主教聖羅撒學校的興辦即是其重要標誌。同時，晚清澳門的教會教育重視平民教育和世俗教育，教會學校從原先主要培養傳教士，招收佈道人員，變為主要招收華人、葡萄牙世俗子弟。教學內容方面，從偏重宗教教育轉變為重視世俗教育、科技教育。例如聖若瑟修院重視科技教育，在1881年重建後，聖若瑟修院仍保留“航海和商業課程”⁽³⁰⁾；又如設立澳門嘉諾撒恆毅書院，它被譽為“澳門第一所女子職業學校”。慈幼中學非常注重職業教育，校內“開設縫紉、革履、木工、印刷”等多項工藝課程，以配合當時社會需要；到1932年開始擴充校舍，並擴辦為完整的中、小學校；1964年9月起為了適應時代進步的需要，增設了電機與機械兩科工業課程，成為一所完全依照香港英文工業學校編制的工業中學。⁽³¹⁾

基督教在澳門的教育事業

18世紀末，英國先後擊敗多個西方列強國家，奪得了海上霸權，並竭力向海外擴張殖民地。為了適應擴張的需要，在英國國內紛紛成立對外傳教的基督教的差會（佈道會）機構。這些佈道會機構訓練了一批傳教士，陸續派往亞洲、非洲國家去傳教。但由於當時中國“禁教”，不准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佈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要進入中國面對着重重困難。19世紀初倫敦佈道會傳教士馬禮遜奉派東來。馬禮遜牧師在1807年11月7日赴廣州途中在澳門上岸，將基督教（新教）傳入澳門，成為第一位進入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來華宣教的拓荒者。⁽³²⁾

為了便於傳教，馬牧師在華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首先他把《聖經》新約傳書譯為中文，並編輯了《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說》、《耶穌教法》等宣教小冊子，請澳門印刷工人幫助印



慈幼學校教室（選自《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頁 32-33）

刷。印刷工人蔡高、雕刻工人梁發因工作的關係接觸到《聖經》的道理，深受其影響而先後接受洗禮入教。除此之外，他還編著了第一部《華英字典》，和米憐一起創辦了第一份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創辦了早期的教會學校英華書院。馬禮遜牧師所首創的譯經、辦報、出版和開辦學校等活動，成為後來來華新教傳教士進行傳教的主要方式。⁽³³⁾

繼馬禮遜之後，西方國家的傳教士接踵而來澳門進行傳教工作。1831年底荷蘭教會派德國籍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來到澳門。他利用自己會說流利華語的有利條件，以行醫為名進行傳教，其後他要求自己英國籍的妻子溫施黛

(Wamfill) 在澳門寓所開辦一所女塾，專門招收一些貧窮家庭的女子入學。溫施黛(Wamfill)除了用少量時間教學生讀英語外，大部分時間致力於向孩子灌輸基督教義，這是基督教(新教)在澳門辦學之始，也是澳門華童女子學校之始。⁽³⁴⁾

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突染急病去世。為紀念傳教士馬禮遜(Dr. Robert Morrison 1780-1834)在華傳教的業績，1835年1月26日在華的英美籍基督教傳教士和商人共二十二名發起成立“馬禮遜教育會”。這個教育會既非傳教團體，也不受任何差會指派，經費以捐贈、贈予與其它方法籌措，以學校或其它方法促進或改善中國教育為目的，其主要工



慈幼學校門口今（下）昔（上）（選自《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頁25）



慈幼學校聖母廣場前地師生留影（中）今（下）昔（上）（選自《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



慈幼學校聖母廣場前地師生留影今（下）昔（上）（選自《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





慈幼中學小學部操場今（下）昔（上）（選自《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頁30）



首批慈幼會士與澳門主教合照（02.04.1906）（選自《慈幼會來華百週年紀念特刊（夢境延伸）》頁46）



第二批派往中國的傳教士（1912）（從左：范德理修士、Bannan 準初學生〔+1920〕、金以義神父、耿其光神父、賀道行神父、委師傅、路加士神父、司徒廉修士、楊春忱神父）（選自《慈幼會來華百週年紀念特刊（夢境延伸）》頁56）



馬禮遜牧師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乃基督新教更正教派來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於 1807 年 9 月 4 日抵達澳門，主要著作有《華英字典》與舊新約聖經《神天聖書》。馬牧師及其家人現安葬在澳門白鴿巢前地基督教墓園。(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五十八期頁 2)

作是開辦與管理“馬禮遜學校”。為了早日創辦馬禮遜學校，該會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籌備工作：1) 籌建馬禮遜教育會圖書館，為創辦學校準備圖書資料；2) 調查有關中國當前的初等教育狀況，為未來舉辦的教育活動提供借鑒；3) 聘請校長與教師，有了師資，辦學便有了重要的依托；4) “馬禮遜教育會”資助傳教士辦學，如每年向郭實臘夫人溫施黛 (Wamfill) 創辦的學塾提供三百十二圓資助 (即每月撥款 15 圓，又在私人處募集十二圓)。(35) 據曾在兩間學校就讀的容閱在其所著《西學東漸記》記載：“(……) 古夫人 (指郭實臘夫人溫施黛) 所設塾，本傳授女生，其附設男塾，不過為馬禮遜學校之預備耳。馬禮遜學校發起於 1835 年，至 1839 年成立。未

成立時，以生徒附屬古夫人塾中，酌撥經費，以資補助，是予本馬禮遜學生而寄生於此者。”(36) 由此可知，溫施黛 (Wamfill) 所辦的學塾與馬禮遜學校有着一種傳承的關係，是作為後來馬禮遜學校的預備。溫施黛 (Wamfill) 關閉其女塾和男塾後，1839 年由應邀而來的美籍傳教士布朗 (Rev. Brown) 在澳門正式成立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最初招收了容閱、黃勝、黃寬、李剛、周文、唐傑六名中國學生。這是一所基督教 (新教) 為傳教而在中國創辦的“洋學堂”，校內教授算術、地理、英語和國文等科。布朗記述當時學校的情況說：課程安排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早上六時開始上課，至晚上九時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做運動和娛樂。(……) 他們努力使在學的孩童有在家的感覺，給學生以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教育。(37) 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如容閱和第一位著名西醫黃寬即是這所學校培養出來的高才生。馬禮遜學校於 1842 年遷香港續辦，校址所在的山後來被港英政府以馬禮遜的名字命名為 Morrison Hill。“馬禮遜學校”的興辦對促進教育、培養人材、更新觀念都起了積極作用。

到 1844 年 10 月 22 日，一位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 (Andrew Patton Happer) 抵澳門傳教。他先創辦澳門男子寄宿學校，招收了三十多名學生，向學生講授科學文化知識和基督教教義。1847 年 3 月，哈巴安德轉至廣州傳教後，將該校遷至廣州故衣街。(38)

基督教傳入澳門後，馬禮遜牧師等傳教士雖然竭力進行傳教工作，但適逢清政府禁教時期，澳門耶穌會又禁止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來往，因此基督新教在澳門的教育事業便停頓下來。此外，1836 年浸信會來華傳教的第一位牧師叔未士 (Rev. J. Lewis Shuck) 夫婦也曾在澳門從事教育，華籍牧師黃煜初也於 1885 年辦過盲女教育。1900 年 7 月因義和團運動爆發，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創辦的格致書院遷至澳門，改名嶺南學堂 (即後來嶺南大學前身)，招收對象以男生為主，祇兼招少量女生。該校於 1904 年再遷回廣州。1906 年由新教傳教士發起成立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後，在澳門監牢斜巷設立志道堂小學。(39) 而到 1919 年，再由教友余美德醫生倡辦志道堂幼



錢納利繪〈馬禮遜牧師及其翻譯聖經的助手們〉（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五十八期頁 29）

稚園，這是澳門第一所西式幼稚園。1932年募捐籌辦蔡高紀念學校，以紀念當年馬禮遜在澳傳教之第一名信徒蔡高先生，因而原有之志道小學亦易名為蔡高紀念學校；自1946年開辦初中，在已故的余豔梅校長的努力下，以後年級按年遞增，1952年7月3日舉行高中第一屆畢業禮，至是形成了一所完全中學。⁽⁴⁰⁾

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由“禁教”到“弛禁”，直至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被迫“護教”，這一切都標誌着執行了百多年的“禁教”政策的解凍，也稱得上是晚清時期基督教政策的根本性轉變和近代中外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基督新教的傳教士意識到辦學能將西方教育制度和方法引入中國的重要性，他們比天主教傳教士更重視教育、醫療和文字工作。⁽⁴¹⁾儘管其辦學的動機是為了宣教，方便傳教士向本地教師學習漢語（包括方言），以及培養本地的佈道人員，藉此擴大基督新教的勢力與打開更多傳教的渠道，但在客觀上，這些學校的創辦對 19 世

紀上半業澳門教會教育的發展還是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結語

教育是教會在中國傳教事業重要的一環，也是對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早期的傳教士採取了許多間接佈道的措施，力圖衝破傳教工作的僵局。當時的傳教方式除了注重口述宣傳基督的福音之外，亦相當重視兒童教育，創辦男女學校及主日學校。⁽⁴²⁾然而，曾一度輝煌的澳門教會教育到晚清時期，辦學規模、發展速度和辦學層次與同時期的香港、中國內地（廣東）相比，明顯滯後了。新式華文教育與澳門葡文教育的興起，逐步打破了教會對澳門教育的壟斷，開始走出單一的宗教教育體制，並在一定範圍內彌補了澳門教會教育發展的不足。



基督新教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 (1784-1854) (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58 期頁 20)



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58 期頁 6)



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58 期頁 6)



中國近代第一位著名西醫黃寬。黃寬早年畢業於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 年與容閱一起隨校長布朗去美國，在馬塞諸塞芒松學校讀高中，兩年後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1857 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1858 年回廣州行醫，並在海關兼任醫官，1878 年因積勞成疾去世。
(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58 期頁 7)



容閱 (1828-1912) 肖像，容閱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後，倡導計劃並促成清政府於 1872-1875 年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學，許多人學有所成，對中國近代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
(選自《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58 期頁 9)



蔡高學校第一校舍（舊址）（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7）



蔡高學校第二校舍（舊址）（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8）



蔡高學校第三校舍（舊址）（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8）



蔡高學校創辦人（第一任校長）余美德醫生
（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9）



余艷梅校長（1942 - 1967）
（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11）



1949年蔡高中學初中首屆畢業生合照（選自《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40）

一、澳門教會教育歷史悠久，架起東西文化交流之橋樑，為澳門未來教育發展找到新的契機。天主教教育影響較大，基督教（新教）教育的影響則較小。澳門原屬香山縣，聚居的人口以華人佔大多數，其文化教育的主體，自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一脈相承的。開埠前，澳門教育不甚發達，以民間團體辦的與私人辦的傳統鄉塾與社學為主，課以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均屬中式傳統的封建教育，旨在應科舉、教識字以應付日常所需。像中國各地一樣，能十年寒窗苦讀求取功名的祇是少數富裕家庭的子弟，大多數漁民或農民子弟還是以接受家庭教育和生產技術教育為主，以接受廟宇、公祠等開辦的社學、學塾教育為輔。⁽⁴³⁾在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以來，天主教會已經開始辦學傳教。耶穌會先後在澳門創辦聖保祿公學和聖若瑟修院，以培養準備進入中國、日本等地傳教的神職人員。前者是中國最早的教會學校，後來陞格為西式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後者為澳門第二所高等學府。及至1807年，馬禮遜將新教傳入澳門，之後基督教（新教佈道會）在澳門開辦了馬禮遜學校等幾所教會學校。儘管這群傳教士志在傳教的目標鮮明，學習漢語祇是一把鑰匙，學術傳教亦為一種手段，但客觀上卻給古老的中國送來近代的西器、西書、西藝與先進科技、西方的學術成就，使中國智識分子眼界大開。直到1911年，澳門天主教會開始注重中文教育，在往後的日子陸續開辦了氹仔的聖善學校，望德堂區的公教學校、聖若瑟中文部，臺山的花地瑪真原學校等，以滿足當地的華人子弟和部分因“九一八”事變而移居澳門的華人子女入學的需求。⁽⁴⁴⁾基督教（新教）教育在19世紀中萌芽。在鴉片戰爭前，新教曾一度辦了三所學校，即著名的馬禮遜學校、溫施黛女學塾、叔未士夫人學校，但此景象祇是曇花一現。香港開埠和五口通商後，新教教育長期處於徘徊停滯階段。其時澳門的外國宗教勢力以葡萄牙人支持的羅馬天主教為主，新教傳教士祇是迫於形勢在此暫時棲身，澳門不過是西方傳教士的一個跳板。⁽⁴⁵⁾但總的來說，教會教育在當時的澳門仍是一枝獨秀，它不僅開啟了明清教會教育和中

國西式高等教育之先河，而且最早將近代西方的教育制度與理念引入中國。

二、教會女校的興辦衝擊了中國傳統教育制度。中國古訓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封建社會，女性長期受歧視，女子教育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當時的女孩子祇有通過家長或者請私塾老師上門才可受到一點點教育。已婚的女性職責就是當好夫家的女管家和母親，更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接受教育。科舉制的建立，也祇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男性官員。因此，政府舉辦女子教育似乎是毫無意義的事。因此，近代以前始終沒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機構，形成“女子無學”狀態。但女子教會教育卻是整個教會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興辦女子教會教育的天主教修會主要有嘉諾撒會、仁愛會、慈幼會等；基督教主要有倫敦會、浸禮會、長老會等。澳門女性接受正規學校教育是以教會女校為發端的，如基督教的溫施黛女學塾、叔未士夫人學校，天主教舉辦的聖羅撒學校等。這種有別於封建傳統教育的教會教育在鴉片戰爭之後由西方教會將女子教育帶進來，向澳門女性傳授了大量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技能，倡導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觀念。

三、教會教育從以宗教教育為主到以世俗教育為主的轉變。無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均以教育為媒介，輸入異質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注入了催化的活力，使更多的中國人瞭解西方先進的教育體制，從而認識到要富國強兵，就應像西方國家那樣，用科學知識培養人材。伴隨着教會學校傳教目標日趨減退，轉向以教育人材為主要目標。正如嶺南學堂自1900年遷居澳門改名為格致書院後，課程水準與當時的官立、私立學校相當，“每週課程有《聖經》、英文、地理、歷史、算術、數學（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動物、植物、生理學及圖畫、體操等。”⁽⁴⁶⁾該校以重視科學教育和人格教育為辦學的兩大特色，既“施行人格的教育養成科學人材，適合中國之需要；又着重人格的訓練，尤以基督犧牲精神為榜樣，培養學生勇於服務的精神。”⁽⁴⁷⁾這也正是教會教育能在澳門一系列教育活動中得以在

中國落地生根的原因，表明了教會學校的世俗教育功能已逐漸為社會所接受，並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形勢。教會在澳門的傳教活動，雖被認定受殖民主義的利用，在客觀上起到促使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獨特作用。他們是中國最早和較好的西學教育機構，不但為中國培育大批人材，也為澳門教育的近代化付出心力，其貢獻是不容否定的。

教會教育在相當長時期，承擔了澳門教育的主要職責。儘管天主教、新教在澳門的境遇於不同的時期有所差異，但教會這種辦學的傳統得到了很好的嗣承；進入清末，澳門教會教育得到了持續發展。經過幾個世紀的佈道、辦學和其它宣教活動，澳門的天主教教育和基督新教教育仍在持續發展。教會教育因澳門是個開放城市而得以立足，而澳門教育又因教會學校的存在而增強其開放性、國際性、先進性，成為澳門教育多元性的重要因素。

【註】

- (1)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852-876。
- (2) (37) 黃啟臣：《澳門歷史》，澳門歷史學會出版，1995年，頁284；頁277-278。
- (3)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41。
- (4) 引自前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司長施綺蓮1994年在明愛幼稚園揭幕禮上的致辭，載於澳門《教育暨青年報》，1994年12月，頁8。
- (5) 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14-15。
- (6) 王文達：《澳門掌故》之七〈大三巴牌坊詳考〉，澳門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93。
- (7) 夏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載於華中師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同見夏泉：〈澳門聖若瑟修院研究〉，載於《澳門研究》第14期，澳門基金會，2002年。
- (8) 利瑪竇著，羅光譯：《利瑪竇全集》，臺灣輔仁、光啟聯合出版，1986年，第4冊〈利瑪竇書信集〉下，〈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里亞諾神文書〉，頁432。
- (9) (27) 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澳門教區成立四百三十週年教聞摘錄》(1576-2006)，澳門教區事務統籌秘書處出版，2006年7月版，頁1；頁2-4。
- (10) (11) [葡] 山度士 (Gomes dos Santos)：〈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1期，澳門文化局，1994年，頁16；頁11。
- (12) (20) M. Teixeira (文德泉)：'The Church in Macau,' in R. D. Cremer (ed),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Hong Kong: UEA Press Ltd, 1987, p. 42.
- (13)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5章〈遠東的“傳教之母”〉，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37。
- (14)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北京，民國十九年刊本)，第6輯，〈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一)》，第45號檔，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88。
- (16) 前揭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章〈澳門早期的教堂〉，頁60-66；葡·科斯塔 (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5期，1998年，頁20。
- (17) 葡·雷戈 (Diogo Caldeira Rego)，〈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手稿) 1623年寫於澳門，中譯本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1期，澳門文化局，1997年，頁147。
- (18)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6章〈亞歷山大·德果烏維亞、傳教團神父和耶穌會士的返回〉，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54。
- (19) 詳見〈文化司署耗資八百萬重修，後日對外開放，聖若瑟修院教堂煥然一新〉，載於《澳門日報》1999年12月1日；〈聖若瑟修院聖堂——深藏着的珍珠〉，載於《澳門日報》2008年7月27日，C4特刊。
- (20)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之〈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澳門主教公署出版，1982年，頁19。
- (21) 葡·施白蒂 (Beatriz A. O. Basto da Silva) 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8世紀)，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158；頁183。
- (22) 張澤：《清代禁教期之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2年，頁206。又見[法] 樊國陰 (Octave Feneux) 著，吳宗文譯：《遣土會在華傳教史》，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頁160；頁166。
- (23) 前揭張澤：《清代禁教期之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2年，頁214。
- (24) 前揭[法] 樊國陰 (Octave Feneux) 著，吳宗文譯：《遣土會在華傳教史》，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頁146。
- (25) (43) (44)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1、頁63-64、頁224-225；頁9；頁11。
- (26) 《澳門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頁24、頁35；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之〈從澳門教區歷任主教說起〉，澳門主教公署出版，1982年，頁6。
- (27) (30)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582-584。
- (28) 同註(28)，《澳門慈幼中學九十週年特刊》，頁24。
- (29) 葡·施白蒂 (Beatriz A. O. Basto da Silva) 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8。
- (30) (35) 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9；頁207-210。
- (31) (39)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70；頁73。
- (32) 容閔：《西學東漸記》，中國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7-69。
- (33) 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74。
- (34)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校慶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9-1999)，頁6。
- (35)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9。
- (36) (46) (47) 朱有曦、高時威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期)，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44；頁527；頁563-564。
- (37) 李桂玲編著：《臺港澳宗教概況》之〈澳門宗教(基督新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464。